

關中方言詞語考釋

任克



西安地圖出版社

69050

关中方言词语考释

任克著



200690500



西安地图出版社

020020
5/11/11
(陕)新登字 013 号

责任编辑 毛腊梅

封面设计 鲍 锋

版式设计 杨俊杰

书名题字 罗坤学



关中方言词语考释

任 克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 12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0 印张 21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545-424-8/H·1

定价 9.50 元

自序

终生从事教学工作，又一直未离开家乡——西安。每每对民间口语里那些只具音、义、而其形体无法写出的词语，不能了然于心。对这一语言现象颇有感触。于是遂萌发了搜求关中方言词语，考释其音、形、义及其出处、例证，以穷其本的念头。

时有古今，地分南北。数千年风云岁月给人们的交际工具——语言，蒙上了不少的历史尘霾，关中方言自不能例外。探究方言渊流，要花费很大力气，拭去蒙在语言上的灰尘，就要比较古今语音的转变，考释字义的发展、引申，详析字形的结构。方能达到寻源竟流之目的。进而还可以为某些古文献中之部分词语作更确切的注释，以疏通其义。使人们更清楚、明晰地认识曾在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官方通用语言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关中方言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研究关中方言当以音义为首要。章太炎先生说：“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转注假借说》引自周秉钧《古汉语纲要》）就是说音、义相同之字，可能有多种书写形体，形、义相同之字，其读音间或有异，如因岁月流逝，或因地域阻隔；或由双声，或以叠韵而读音变异。钱玄同先生也说“小学包形、音、义三端。而音为首要，因形、义之变迁多以音之通转为其枢纽，故前代之声韵学必当讲求”（《钱玄同音学论述选辑》）。

治方言也脱不了形、音、义之窠臼。当然也要以声韵为首

要。

方言就是地方话，口头之活语言，也叫俚语。今之俚语往往是古代的通语、雅言。关中方言好些词语是上古、中古之通语的“活化石。”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可贵资料，所以选取词目不可因其粗鄙而弃之。林语堂先生曾说“研究方言应注重俗话而略于字音——若要求古音古字，最怕的是只在反切势力范围内的字音寻求。字音已受过反切及韵书的影响，不能於考古上有大贡献。最应当注意的是各处的‘白话’，愈白而愈好，愈俗而愈妙。因为甚么？一来因为语言的实在生活是寄存於俗语中，二来因为古音古字的痕迹也是寄存於俗语中，若我们有点儿蔑视土语土腔的成见、我们便不配研究方音。”

应当指出，语言虽不能象政权那样有大起大落的急骤变化，但它却经常在人们难以觉察的情况下演变着。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之际，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量大、因之民间口语之变化甚为显著。从事语言工作者若不从速调查，搜集、则在不久的将来、相当大一部分词语将会从口语中消失。也就是说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中一大部分要消失。改革开放不能逆转、经济发展不能逆转，社会交流不能逆转、口语演变也不能逆转。语言工作者对“关中方言”除尽速采集以外，别无他途。

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除《关中方言溯源考》与《关中方言词语考释》所收的词目以外再列举几例，以便人们对“关中方言”在古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所重视：

1、《集韵》：“射，仆射，官名。射者武事、古者重武，以主射名官。”

《汉官仪·五》注：“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督课之，故名。”颜师古曰：“射，本读如字，今音夜，盖关中字转为

此音也。”

2、先后，《史记·孝武帝纪》：“故见神於先后宛若。”索隐：“即今妯娌也。韦昭曰：‘先娒后娒，’”。颜师古注：“关中俗呼为先后”。

3、《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悟邦）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悟邦宫）。”此“悟邦官”亦关中方言。（详见附录《阿房何义》一文）。

从上三例中可见关中方言对古汉语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最后希望这个册子在这方面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愿足矣。其中差错、失误在所难免，望各方高明指正。

灞陵 任克 1994年3月

几点说明

这个册子共收关中方言，西安附近之词语 814 条。至于虽为方言词语，但系常见而易读易写者一般不予收录。它既名“词语考释”，就不是单纯以谐音取义的词典，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所录词目从音、形、义三方面，主要是从音、义两方面予以考释，力求词目有出处，有例证，竟本溯源，以明其本义，定其形体。

1、所收词目以西安近郊为限。

2、词目顺序按《汉语拼音方案》之字母次序排列。以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3、词语之声调借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声调符号”，按关中方音的调值标示。

如“妈”字的调值：

普通话为妈麻马骂

关中话为骂麻妈马

关中话“妈”字的调值为普通话的第三声，故标为第三声，“骂”字的调值为普通话的第一声，故标为第一声。这样作，虽然二者之间四声调值不完全相同，但却极接近。变通一下，可以借用，不至于出错。

4、有些词语的读音为《汉语拼音方案》所无者，则以“国音注音符号”（国音字母）补救之。如以“万”注物，以“兀”注鹅。以拼音字母标之，则为“V”、“ng”。又利用“ng”的后鼻音为“后”注音如“hng”。（关中后有三个读音：hou、hu、hng。）

5、为方便读者，除用拼音字母注音外，再以同音汉字注

音,其声调不合者,则注明应读第几声。如“跑”音包(第二声)。

若无同音之汉字可直音者则以反切法补救之。如“扁”音彼亚切。“稔”音入阿切。有的词目读音不变者则写作“读如字”。

6、一字两读者则作两个词目对待。如“姝”既读 bao(姝面),又读 pai(姝暢)。

7、所收词目力求有出处,有例证,有现代口语例句。但不能每词都能具备。

8、各词目除用拼音字母注音外,并用汉字以西安地区之读音直音,以便关中农村读者阅读。

关中方言渊源考

关中是周秦的发祥地，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关中一带的语言，曾被视为正音、通语，亦即古人所谓的“雅言”，并几度由政府向全国推广。因而，关中方言对全国语言，尤其对北方语言发生过较重大的影响，和古汉语的关系也至为密切。

一、关中方言即古之“雅言”

清人刘宝楠有过这样的论述：“周室西都，当以西都为正音。平王东迁，下同列国，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称风，而西都之雅音故未废也”（《论语正义》）。就是说周室东迁以后，作为标准语言并由周室向全国推广的西周“雅言”，仍对全国语言起着主导作用，刘氏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从“雅言”这一角度出发，弄清了为什么《诗经》里既有“大雅”、“小雅”，又有“王风”，他的这一论断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汉杨雄在写《方言》时，根据当时的语言实际，把秦晋一带划作一个方言区（有时单指秦，有时则曰“自关而西”）。周祖谟先生在《方言校笺序》中亦称秦晋一带语言为“雅言”。今人洪诚则更进一步作了如下的阐述：“西周都沔、镐，政治中心在陕西，所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为雅言，为通语”。于此可以肯定古代关中方言就是所谓的雅言，是官方的通行语言。

二、“雅言”之得名

“雅言”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夫子在什么场合操雅言呢？在诵诗、读书或在朝会和隆重典礼上都操雅言。而平时就用鲁国的方言即鲁语。清人刘台拱在《论语骈枝·释雅言》中说：“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由此可知当时的关西雅言远及今山东地区。可见西周时推行雅言是一件大事。到春秋时期，孔子尚如此重视雅言的社会作用。这里只透露出雅言在全国普及的一点消息（详见后）。至于关中语言何以要称作“雅言”当须进一步探求。

《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此处的“雅”似专指地区而言，这里的“雅”是和“越”、“楚”等地区称谓并列的。但“雅”究指何地，则尚不明确。再据《荀子·效儒》：“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我们知道“夏”是指地区而言的，即夏族诸部所居住的地区。且两段中“楚”、“越”相同，“雅”、“夏”似可互代。雅可能为夏之音转。又《墨子·天志下》引《诗·大雅》径称“大夏之道”。则直接以夏代雅，是“雅”即“夏”之确证。于此我们得知“雅”即“夏”。但何以能代夏？周族和夏族有无渊源瓜葛？亦须探求。

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论述夏、周的关系颇详尽，今转录如下：

“盖周族始祖为姜嫄，姜本羌之异体字，故知周族实为羌族之一支。

周族既以羌族女子为始祖，故其为羌族之一支，实无疑义。《诗·大雅》：‘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则周族又尝以周羌自命，羌为西夏之族，故而以‘夏族’为其‘先民’。

《召诰》云：‘相古先民有夏’不仅如此，周人且自称为夏，如《立政》篇云：‘乃乎我有夏’。《君奭》云：‘惟文王克修和我有夏’。《康诰》篇云：‘需肇选我区夏。’由此可证明周族实羌族的一分支。亦即西夏的苗裔”。（《中国史纲》第一卷第260页）

据此可知，周族和夏族有其渊源关系。同时我们已知“雅”等于“夏”，周来源于“夏”。有时周自称为夏，故周语即夏言，夏言即“雅言”。以上是从翦老论证周、夏民族渊源的启示下，我们因之得以探究“雅言”的渊源。

章炳麟先生从语音角度对雅言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诗谱》云：‘迺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地，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徐铉切雅字作乌加，古在鱼模，则正如乌也。）若雁之与鴈，鳧之与鹭矣。大小正者（正即雅之或体），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章炳麟《大正小正说下》）。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明确三事：

（一）、“正为“雅”的异体字，“雅”又为“乌”的异体字，它们之间的关系若雁之为鴈，鳧之与鹭。

（二）、关中之方音称作“雅”是从西周开始的（上文所谓“然则称雅者放自周”。放自周，即从西周开始之意），周秦同地，周秦之音即夏音，亦即雅音。

（三）、雅之为音本为秦声，秦声乌乌，故名之为雅。雅之原义本为秦地人之“击缶搏髀”（敲着瓦盆，拍着大腿）而雅雅放歌的古朴之声，其后因“雅言”为王都所在地之音，故而遂演变

为高雅、文雅、淡雅、素雅、清雅、幽雅、雅致、雅兴等出俗、超脱之义，反而失去了秦声本来具有的粗犷、高昂、激越、奔放、古朴之义。这就是雅言的来源。

三、雅言在祖国语言史中的地位

1、《荀子·正名》：“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荀子在这里指出：刑法应以商代为依据，官爵名称应以周代为准，礼节仪式应以《礼》为依据，至于一般事物名称则应以诸夏之“约定俗成”的普通用语为依据。这么一来，边远地方，风俗各异的地区就会因之而互通其意了。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这句话的含意。洪诚对之作了解释，他说：“非政治制度的一般事物语词就应当以中国语即夏语旧俗相传的语义为标准”。（《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第54页）他又引用邢公畹的解释来阐述此段的语义：“散名的使用，应以诸夏语中的‘雅言’（诸夏之成俗曲期）为标准而加以通释”。（同上书同页洪注）可见当荀子时，雅言在全国仍居于主导地位。

2、《周礼》中也明确记载西周对语言文字的统一相当重视。

《周礼·春官·外史》：“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文中“掌达书名于四方”，疏云：“古曰名，今曰字，古者之文字少，直曰名；后代文字多，则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称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却而读之也。”洪诚引邢公畹在《谈荀子的语言论》一文中的一段话对“名”的阐释更为明晰：“先秦

诸子所说的‘名’，不等于现代的‘名称’，也不是指书写的文字，而是指口头说的‘字’。先秦人称语言里的字叫‘名’，称文字叫‘书名’或‘文’。”据此可知西周的外史官有一项任务，就是向各诸侯国经常进行文字的匡正工作，匡正的标准当然是“雅言”。

《周礼·秋官·大行人》下有一段话：“……；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书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注〕云：“属，犹聚也。自（王巡狩）五岁之后，遂间岁遍省（xing）也。七岁省而召其象胥，九岁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之于天子之宫而教习之也”。又云：“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这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西周王朝要定期将诸侯国的翻译人员（象胥）或从事音乐的乐师（瞽史）召集到王宫里，进行语音、语言训练，以统一语言文字，校正发音，达到“达其志，通其欲”的目的。证明西周王朝曾对标准语言、文字的推广是极其重视的。

3、郭沫若先生也曾不止一次的指出秦以前西周时期曾出现过统一语言文字的盛况。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出现周、秦两次同文之盛”（详见郭著《两周金文大系》和《文物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4、黄焯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一书中也说：“《中庸》称非天子不考文，以天子有考文之官也。（《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据此则不但考其文字，且兼正其声音。）盖同书文字，天子之事，其来自古，非始于秦，宣王之颁籀文，始皇之定小篆，其意一也。”黄先生也与郭沫若有同样的看法。

依据《荀子》、《周礼》和郭、黄二氏的论著，我们可以确认，

早在秦统一文字以前，西周也曾进行过统一语言文字的工作。

近人范紫东先生在《关西方言钩沉·序》中说：“我国民族导源于西北，故夏声之音，关中实得其真谛，盖民族孕育于斯，语言孳乳于斯也”。

四、探究关中方言对古汉语的研究关系至为密切

正因为关中方言在历史上曾作为通语、官话被推广使用，被称作雅言，所以关中方言俚语中也就保留了不少的古音、古义。这是研究古汉语不容忽视的一个领域。

齐佩瑢先生在《训诂概论》一书中说：“语言文字本无雅俗之分，古之俚语即后之雅言”。

齐先生的论断是很有见地的。姚文燮以《尚书》诸《诂》为例论证了古无文言俗语之分。其后因岁月更替，时代阻隔，词义演变，语音变转，遂产生了古今语言文字之音的差异。雅俗之分也随之相去渐远。由此可知，今日的所谓俚语俗言中仍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文言词语，为人们日常口语所习用，但却不知其为文言词语，诚所谓“习焉而不察”了。

今天我们尚能从下面三个方面看到关中方言里仍保留着相当数量古汉语的语音和语义的文言词语。

1、语音变易
(1)、先乎儿。关中日常有这样的话：“我今天先乎儿迟到了”、“先乎儿把我跌了一跤”等等。仔细推敲，“先乎儿”当为“险乎”的音变。“险”被读作“先”再加儿化韵，就完全脱去了文言色彩，而俚语化了（有些地方还读作“西乎儿”）。

(2)、律续(lǜxǔ)。口语中这样的话“今天客多，等不齐，不如律续来，律续吃吧”。案“律续”当为“陆续”。

因为“陆”有时可读作“六”（如六字的大写），而“六”又与

“绿”可同音读为“liu”，而“绿”又读作“lu”，故而“陆”可读作“律”了。

(3)不卯。口语谓两人不和睦曰“他俩不卯”，这是“睦”之读音转为“mào”的结果。(mao、mu)二音之间的转变，详见《西安今古》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拙文《关中方言探源·六》文中“毛头”一条。

2、语义讹误

(1)、饰诡。今一般作“失鬼”，有时还作“日鬼”难以训解，“日鬼”则更不雅训。考之本源，乃为“饰诡”。据王阳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文中有“规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顽鄙”。文中“设诈”、“饰诡”连用，其义甚明。故此得知“饰诡”一语原指人掩饰诡诈之义。语义确切而典雅。

(2)顽皮。小孩子不听话叫作“顽皮”，现在一般这样写，但“顽皮”何义，则很难训解，据上条“饰诡”之引文“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的“顽鄙”一词才是正确的书写形式。其含义乃是“顽劣、鄙陋”之义。

3、今天纯为方言、口语，在古代则为通语官话

(1)、加二等。口语中有谓更加厉害为“加二等”之语。如：“你说张三心眼黠(hǎ,坏的意思)，我看李四比张三还加二等”。这里的加二等即加倍的意思。好像是民间随口而出的词语，岂知就这样平易的语言材料，竟来自春秋时期的官方用语。如《左传·僖公四年》：“凡诸侯薨于朝，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2)、乡党。尽人皆知，关中把同乡之人称作“乡党”。乡党一词始见于《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和《礼记·曲礼》：“州闾乡党称其孝也”。

乡党一词实来自周代的一套地方行政编制。《周礼·地官》有乡、州、党、族、闾、比等一套基层地方行政组织。

《释名·释地》也说“五家为伍，又谓之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人们遂以乡、党二级错举以指代家乡，后来又指代家乡之人。

(3)、骄豪。为人好强，做事霸道叫“骄豪”。如“这娃太骄豪，无论吃的穿的，他都要比别人多占些”。

《三国志》“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

《三国志》陶谦病笃，让徐州给刘备，刘备则推荐袁术。陈登反对说：“公路(袁术字)骄豪，非治乱之主”。

又《三国志》述刘备之妻孙夫人东归吴而欲将刘备的儿子也带去曰：“孙夫人骄豪”。

盖“骄豪”乃当时通语。

4、“有音无字”

有些口语语汇好似有音而无字，其实并不尽然。也许真是有音无字，只在口语中用，而不见于书面形式。也有些是有其字，因读音古今变异，音、形、义互相脱节，人们一时弄不清其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然。

(1)、脓 nóng。关中读第二声，谓疮口化脓之脓。但在另一个含义中则读第一声“nōng”，意为半溶解状态之义。如“饭熟了好长时间了，把面都滯(音泡)脓到锅里了”。

《齐民要术》“水稻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脓即烂也。盖被芟割之后，因在水中浸而烂死。

(2)、垢圪 gòujiǎ。民间把身体或器物上的污垢叫“垢圪”。如“身上的垢圪多么厚！”

《山海经·西山经》有“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郭璞注：“洗澡可以磳体去垢圻。磳，初两切。”
(3)、髦鬻子 māogǎizi。关中有把少女的发辮叫“髦鬻子”。如“那个姑娘的头发黑鬻鬻(音沉)的，髦鬻子长鬻鬻(音 sǎ)的。”

《南史·倭国传》：“男女皆露鬻”。

《说文》：“髦，发也”。
《尔雅·释言》：“髦，俊也”。

是“髦”有头发美好之义。

《说文》：“鬻，管结也”。

《玉篇》：“鬻，同髻”。

现在的问题是“介”的读音，“鬻”、“圻”两字都从“介”得声，而“介”的声母是：“j”，“鬻”的声母是“g”，“圻”的声母也是“g”，声母不同是怎么回事。原来“j、q、x”三个声母是北宋以后由“z、c、s、”和“g、k、h”两组字母中的部分字音演变而产生的。

(4)、辱(𡇗)nóu。不洁净叫“辱”。如“看你把衣服弄辱咧！不要再翻乱了。”引申之，把一些不知廉耻的人则叫做“辱脸鬼”、“辱怙”。

《周礼》郑玄注：“隶给劳辱(脏)之役者”(引自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辱在这里明确为脏义。

《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辱”，注：以辱对白，辱有黑义。

《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德若谷，大白若辱”。注：傅本、范本作“𡇗”，范曰：“𡇗，音辱，黑垢也”。按黑垢就是不洁，就是脏。